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1949~2009

下

宋大川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1949-2009

下

宋大川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第七章

北京辽代考古

五代初期，幽州等州郡先后属后梁、后唐管辖。公元936年，后唐将领石敬瑭叛唐自立，联合契丹灭后唐，并由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为帝，建立后晋。作为交换的条件，石敬瑭于公元938年割幽云十六州予契丹。辽太宗随即将幽州升为南京(也称燕京)，置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辖顺、檀、涿、易、蓟、景六个州。从此，南京就成为大辽五京之一，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一下变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

南京城在辽朝统治时代是辽统治下的农业地区中最大的城市，它的周围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故它成为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与南北交通枢纽，来自宋朝统治区与来自北方草原牧区的货物都先在此处集中，进行交换。而此后蒙、女真、满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以北京为据点向中原进攻，北京的历史角色开始向全国政治中心转变，其历史地位也日趋重要，逐渐跃升为全国政治统治的中心。

第一节 北京辽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北京辽代考古发现概述

北京作为辽王朝的五京之一的南京析津府，历时逾百年之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辽代考古工作逐渐开展起来，6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和发掘了大量辽代墓葬、塔基、瓷窑址、窖藏、石刻等，其中以辽墓数量最多，见诸报道的共137座，几乎历年均有发现。辽代塔基共发掘31座，是北京辽代考古的一大亮点。此外，瓷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学术界也引起较大的反响。我们根据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北京辽代考古发掘情况，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

1. 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辽代考古蓬勃发展起来，开始得到了科学的发掘和记录。20世



纪50年代发掘的辽墓有西翠路辽墓¹、海淀清河镇辽墓²、西城区西什库辽墓³、西郊西福村辽墓⁴、彭庄辽墓⁵、董匡信夫妻合葬墓⁶等。1958年4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西郊百万庄发掘2座辽代壁画墓，其中1座为丁文道父子合葬墓⁷，此墓为前后两室的大型墓葬，父子皆有墓志，墓室内有壁画。

1960年8~10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北京南郊永定门外发掘了赵德钧夫妇合葬墓⁸，为三进九室的大型墓葬，是北京地区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辽墓。其他重要的发现还有董庠夫妇合葬墓⁹、王泽夫妇合葬墓¹⁰、丰台镇桥南石棺墓¹¹。董庠夫妇合葬墓出土有“灭罪真言”，反映了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流行。王泽夫妇合葬墓壁画脱落，但出土了较多精美的瓷器，为辽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尺。丰台镇桥南石棺墓是北京地区辽代仅有的石棺墓，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一时期发掘的辽墓还有西城区府右街罗贤胡同辽墓¹²、西椅子胡同辽墓¹³、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¹⁴、西城区大玉胡同辽墓¹⁵、先农坛辽墓¹⁶。另外还发现张俭墓志1方¹⁷。

1970年4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宣武区海王村发掘2座辽代土坑墓¹⁸，根据出土的鸡冠壶推测这2座墓属于辽代早期。北京地区辽代土坑墓发现较少，因此海王村辽墓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的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斋堂镇辽墓¹⁹、马直温夫妇合葬墓²⁰。前者墓室内发现精美的壁画，且发现一个墓幢。后者墓内发现有木俑十二生辰像、木雕男像、女像等残件，为北京辽墓中所仅见。

除墓葬外，这一阶段发现的重要石刻有“秦王发愿纪事碑”²¹和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²²。

经过调查，北京地区的瓷窑址陆续发现，发现的重要瓷窑址有了密云县小水峪瓷窑²³、门头沟龙泉务瓷窑址²⁴。门头沟龙泉务瓷窑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反响，在接下来的20年中有关龙泉务瓷窑址是否是官窑的争论持续不断。

- 1 苏天钧：《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2期；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8期。
- 2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8期。
- 3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8期。
- 4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8期。
- 5 苏天钧：《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2期。
- 6 苏天钧：《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2期。
- 7 苏天钧：《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3期。
- 8 苏天钧：《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
- 9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0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1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2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3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4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5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6 马希桂：《北京先农坛辽墓》，《文物》1977年11期。
- 17 苏天钧：《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研究》，《京华旧事存真》（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 18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19 鲁琪：《北京西郊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7期。
- 20 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
- 21 陈育丞：《记辽代石刻秦王发愿纪事碑》，《文物》1966年4期。
- 22 于柯：《北京出土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考古》1979年6期；吴元真：《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再次发现及其整体复原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 23 赵光林：《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窑址》，《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 24 鲁琪：《北京门头沟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5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塔基有云居寺南塔¹、辽净光舍利塔塔基²、北郑村辽塔³。在云居寺南塔塔基旁的藏经洞穴中发现石经版10082块，是重大的收获。辽净光舍利塔塔基出土一批珍贵的辽瓷。北郑村辽塔未被扰动，出土器物齐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2.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北京辽代考古工作迎来了新的一页。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集中在墓葬、塔基和瓷窑址三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

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最重要的墓葬是位于八宝山殡葬管理所院内的韩佚墓⁴，墓内壁画保存较好，内容丰富，出土随葬品比较丰富，瓷器有南方越窑青瓷。越窑青瓷的发现反映了辽与吴越的交往。1986年8月发掘的昌平陈庄辽墓随葬品丰富⁵，有陶器、瓷器等，在墓内发现代表墓主人形象的髻发陶俑。1989年12月发掘的安辛庄辽墓随葬品较多⁶，出土的马镫壶和鎏金铜马具在北京地区是第一次发现。1990年6月发掘的李熙墓出土有秘色瓷⁷。另外还发掘了门头沟新桥街辽墓⁸、羊坊店辽墓⁹、池子大街辽墓¹⁰、上地辽墓¹¹。这一时期发掘的辽代墓葬数量虽然有限，且未见规模较大的墓葬，不过发掘成果丰富，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

20世纪90年代发掘了房山区天开塔地宫¹²、通州辽代塔基地宫¹³、密云县冶仙塔塔基¹⁴等3处重要的塔基。这3处塔基出土有精美的瓷器、木质家具、舍利等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在佛教考古方面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龙泉务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辽代考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1983年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门头沟区文物保管所前往门头沟龙泉务瓷窑进行考察，除发现大量的瓷片，还出土一批琉璃三彩制品，其中有三彩菩萨、莲座彩绘佛¹⁵。1984年春，古陶瓷学者陈华莎女士在门头沟龙泉务遗址采集到2片“寿昌五年”（1099年）琉璃釉炉残片¹⁶。1991~199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门头沟区文物保管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其发掘面积1278平方米，发现窑炉13座，作坊2处，出土窑具及各类可复原的器物8000余件¹⁷。

3. 2000年以后

随着北京申奥成功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为配合基础设施的建设，北京辽代考古迎来了新的时期。

1 苏天钧：《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8期。
2 苏天钧：《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8期。
3 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2期。
4 黄秀纯、傅公钺：《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3期。
5 周景城、王殿华、邢军：《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3期。
6 祁庆国、王武钰：《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6期。
7 王有泉：《丰台区永定路辽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8 刘义全：《门头沟新桥街辽墓》，《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1期。
9 刘连成、李达：《海淀区羊坊店辽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
10 王有泉：《一九九八年北京地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成就》，《北京文博》1999年1期。
11 王有泉：《一九九八年北京地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成就》，《北京文博》1999年1期。
12 王武钰：《房山区天开地宫》，《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周良、姚景民：《通县出土罕见辽塔地宫石函》，《北京文物报》1989年6期。
14 王有泉：《北京密云冶仙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2期。
15 赵光林：《北京地区发现的几处古代琉璃窑址》，《考古》1986年7期。
1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1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这一时期发掘的最重要的壁画墓是大兴区青云店辽墓¹，墓内壁画内容丰富，有理财图、点灯图等。重要的壁画墓还有丰台云岗辽墓²，其壁画脱落严重，墓室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墓葬规模为近20多年来所仅见。另外在大兴新城北区16号地发掘辽金墓26座³，其墓门和墓室内发现壁画，部分墓葬保存完好，发掘前未遭受任何破坏。由于北京的辽墓完整保存的较少，因此这批墓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密云县大唐庄辽墓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⁴，其中1座墓葬由前后两室组成，内放置2合墓志。龙泉务村辽墓没有壁画，墓葬形制简单⁵，但是出土瓷器较为精美，推测这些墓中埋葬的死者与龙泉务瓷窑址有一定的关系。发掘的其他墓葬还有李继成夫妇合葬墓⁶、康公墓⁷、昌平张营遗址辽墓⁸、南正辽墓⁹、天开辽墓¹⁰、昌平张营遗址北区辽墓¹¹、亦庄辽墓¹²、白塔村辽墓¹³、昌平邓庄辽墓¹⁴。

2009年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还在大兴发现一处辽金时代塔林遗址，共发掘塔基25座¹⁵，出土有瓷器、经幢、舍利等。

2002~2003年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对北京地区辽金史迹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将调查工作汇编成书。书中收录辽金塔24座，墓幢26座，辽金经幢30座，遗址、遗迹30余处，另外还有碑、墓志、舍利石函、摩崖石刻等¹⁶。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对研究北京辽金时期的历史有较高的价值。

2000年以后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发掘了大量墓葬和塔基，而且全面调查了北京地区辽代史迹资料。但是在对辽代考古研究方面，由于北京地区辽代遗存在文化性质方面上承隋唐，下启金元，唐代墓葬、金代墓葬与辽墓比较接近，器物也相似，给辽代墓葬的断代带来了困难。因此亟须对辽代墓葬进行分期研究，进一步明确北京地区辽代墓葬的特征，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好准备。

二、北京辽代考古研究现状及认识

自西周分封蓟至辽以前，北京均作为北方重镇和地方中心，辽代则为陪都性质。辽之后，金元明清等王朝均建都北京。因此，辽代是北京从地方重镇发展为全国性的都城的转折点。对辽代北京考古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辽代北京的社会生活情况，而且有助于研究北京在全国地位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

1 王清林等：《大兴区青云店辽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2期。

2 周宇：《丰台云岗辽墓07FHM1发掘简报》，《北京考古》（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3 于璞、王炜、朱志刚、李春山：《北京大兴辽金墓葬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8日。

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密云县大唐庄墓葬区发掘简报》，《北京文博》2007年2期。

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6 王清林等：《丰台路口南出土辽墓清理简报》，《北京文博》2002年2期。

7 朱志刚：《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墓志》，《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南正遗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1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天开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昌平张营遗址北区墓葬发掘报告》，《北京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1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13 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08年9月考古发掘资料。

14 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09年3月考古发掘资料。

15 于璞、韩鸿业、李春山、王冠群：《北京辽金时代塔林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20日。

16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2004年。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辽代考古研究工作随之展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除卢迎红先生在结合对辽金文物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辽金历史遗址分布与分类进行了综合研究¹以外,60年来北京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辽代墓葬、碑刻、佛教遗存、瓷窑址、城址与乡村等方面。

1. 墓葬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辽墓的不断发现与发掘,对辽墓的研究也逐渐展开。由于辽前后长达200多年,且地域广阔,境内民族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亦有所不同,因此辽墓的分区、分期与墓葬形制等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王秋华先生通过对墓葬形制、遗物、墓壁和棺壁的装饰将辽墓以长城为界分为南、北两区²,徐莘芳先生通过对不同时期的辽墓区分出契丹人和汉人,将辽墓早、中期的断限定在1031年³。杨晶先生对辽墓进行简要分期⁴,并归纳出辽代汉人墓葬的特征⁵,之后李逸友先生对辽代汉人墓葬也做了相应的论述⁶。冯恩学先生对辽代墓葬进行了全面考察,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⁷。在辽代墓葬不断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董新林先生从墓葬分型和随葬品分期入手将辽墓分为四期⁸,而秦大树先生将北京地区划分为独立的一区⁹。张鹏先生对包括北京辽墓壁画在内的所有辽墓壁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¹⁰。以上这些研究中均涉及北京地区的辽墓,但是都没有将北京辽墓作为唯一研究对象。对于北京地区的辽墓的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齐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对北京地区辽代墓葬进行了综合研究,探讨了北京辽墓的形制结构、葬具、葬式、壁画、随葬器物、墓志等¹¹。这是关于北京地区辽墓专题的最早研究。之后苏天钧先生对新中国成立以后40年中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砖室墓葬的形制、墓室壁画、出土器物、墓志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和介绍¹²。沈平先生分析了辽代南京地区火葬习俗盛行的原因后,认为契丹人传统的火葬习俗和佛教教义相结合后,其习俗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从火葬墓可以看出汉文化和契丹文化的相互影响¹³。90年代末刘耀辉先生对北京地区辽墓做了简单的类型学研究,并探讨了北京辽墓所反映的辽人的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¹⁴。冯恩学先生认为斋堂壁画墓棺挡板上绘的男侍者头戴的圆顶宽沿笠式帽是元代常见的帽式,并且在棺挡板上绘山水画是元代人的做法,所以这座墓为元代墓葬¹⁵。林沅先生还对昌平陈庄辽墓出土的髹发陶俑性别等进行了讨论¹⁶。近年来,昌硕先生对北京地区辽金墓葬进行了系统性研究¹⁷。

随着辽代墓葬资料的不断发表,对北京地区辽代墓葬的分期研究势在必行,以利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的开展。

1 卢迎红:《北京辽金历史遗址分布与分类》,《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2 王秋华:《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3期。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 杨晶:《辽墓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4期。

5 杨晶:《辽代汉人墓葬概述》,《文物春秋》1995年2期。

6 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7 冯恩学:《辽墓初探》,吉林大学1995年博士论文。

8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8期。

9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彭善国:《二十世纪辽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1期。

10 张鹏:《辽墓壁画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1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12 苏天钧:《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京华旧事存真》(第一、二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13 沈平:《辽南京火葬习俗浅议》,《首都博物馆国庆40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14 刘耀辉:《北京辽墓初探》,《北京文博》1999年4期。

15 冯恩学:《北京斋堂壁画墓的时代》,《北方文物》1997年4期。

16 林沅:《陈庄一号墓女俑身份商榷》,《北方文物》1996年4期。

17 昌硕:《北京地区辽金墓葬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2. 碑刻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地区碑刻的不断发现,学者们的研究逐步展开。1952年北京市文物队于广渠门外寻获辽代石刻“秦王发愿纪事碑”,陈育丞先生对“秦王发愿纪事碑”进行了介绍和初步考证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石刻发现与研究的开端。齐心先生、阎万章先生结合辽代墓志与文献对此碑及萧氏世袭进行了考证与探讨²。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是1971年拆除明代城墙时发现的,1983年又在北京朝阳雅宝路东口附近再次发现残石2块。于柯先生、吴元真先生对《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进行了介绍并对其进行了整体复原,这些残断石经过复原,得到医学界的重视和承认³。

王世仁先生结合1991、1992年天宁寺塔大修时发现的石碑,对天宁寺塔的历史、建筑、塑像及宗教意义三方面进行了研究⁴。王晓静先生对北京地区辽代摩崖石刻进行了简述⁵。

齐心先生对于墓志研究的多方面作用进行了综述,指出了北京辽代墓志研究的多方面作用⁶。鲁琪、齐心、周峰、朱志刚、王玉亭、任秀侠、邢景旺等诸位先生历年考证的墓志有韩资道墓志⁷、董匡及妻王氏墓志铭、董庠灭罪真言、董庠妻清河县君张氏墓志铭⁸、张嗣甫墓志⁹、丁文道与丁洪墓志¹⁰、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¹¹、康公墓志¹²、郑颀墓志¹³、孟初墓志¹⁴。罗继祖先生对后唐北平王赵德钧生平进行了介绍,考释了赵德钧夫人种氏合祔墓志¹⁵。黄秀纯先生考释了辽代张俭墓志¹⁶,并对张俭墓的位置进行了讨论¹⁷。

刘卫东先生论述北京石刻时对辽代石刻有所涉及¹⁸,邢景旺先生重点介绍了房山辽代石刻¹⁹。伊葆力先生对北京地区的辽金石刻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幢类刻石及其演变进行了论述²⁰。

3. 佛教遗存研究

在佛教遗存研究方面,学者们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对辽燕京境内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一批佛教石刻进行了考证。20世纪90年代初齐心、王玲两位先生探讨了辽燕京佛教的发展,寺院的兴盛以及“契丹藏”与辽代刻经等的发展等问题,认为燕京的佛教文化上承唐五代影响,同时与北宋进行相互交流影响,且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²¹。郑恩淮先生通过对山

1 陈育丞:《记辽代石刻秦王发愿纪事碑》,《文物》1966年4期。

2 齐心:《辽代南京留守秦王萧孝穆画像碑考》,《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阎万章:《〈秦王发愿纪事碑考〉商榷》,《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1期。

3 于柯:《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考古》1972年6期;吴元真:《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再次发现及其整体复原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4 王世仁:《天宁寺塔三题》,《北京文博》1996年2期。

5 王晓静:《北京地区摩崖石刻概述》,《北京文博》2004年2期。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7 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8 齐心:《董氏三志考》,《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出版社,2000年。

9 齐心:《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考古》1983年10期。

10 齐心:《辽丁氏两方墓志考》,《考古》1988年7期。

11 周峰:《辽代〈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铭〉考释》,《北京文博》2002年3期。

12 朱志刚:《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墓志》,《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玉亭:《辽代康文成墓志再考》,《北京文博》2008年3期。

13 任秀侠:《辽郑颀墓志考》,《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14 邢景旺:《辽孟初墓志考》,《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15 罗继祖:《关于新出土的三方辽墓志的考证》,《考古》1962年1期;苏天钧:《后唐北平王赵德钧》,《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

16 黄秀纯:《辽代张俭墓志考》,《考古》1980年5期。

17 黄秀纯:《辽张俭墓地辨证》,《考古》1986年10期。

18 刘卫东:《北京地区石刻概述(一)》,《北京文博》2003年3期。

19 邢景旺:《房山辽代石刻叙录》,《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20 伊葆力:《北京地区的辽金石刻》,《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21 齐心、王玲:《辽燕京佛教及相关文化考论》,《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印刷品的题记的研究,考证了辽燕京的圣寿寺等9座寺庙¹,并对山西应县发现的辽代刻经、对其雕造寺庙进行考证,认为这些印刷品大多雕印于寺庙林立的北京²。

20世纪60年代初林元白先生对云居寺的历史,寺内的塔、碑铭、石经进行探讨³。至20世纪90年代杨亦武先生认为澶渊之盟为辽代房山石经的刊刻提供了安定的社会基础⁴,并对云居寺的历史变迁及云居寺内石经历代刊刻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⁵。

学者对佛教石刻的研究主要有:齐心先生对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进行了考证⁶;向南先生对千佛塔露盘题记进行了考释⁷;刘精义、齐心两位先生对房山区北郑村辽塔中发现的经幢题记进行了探讨⁸,并对辽代应历五年经幢题记进行了考释⁹;包世轩先生对门头沟区即辽代玉河县境内的辽代寺院碑刻进行了考察¹⁰,并对门头沟区发现的辽玉河县清水院经幢进行了考释¹¹,对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进行了深入的考证¹²;齐鸿浩先生对门头沟发现的辽代伎乐经幢报道¹³,并进行了考释¹⁴;任昉先生对《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幢》进行了考证¹⁵。齐心、刘精义两位先生还对房山南郑塔基中出土的“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进行了考释,认为“大蕃”可能是对辽的一种称谓¹⁶。

梁玉贵先生对房山陀里花塔提出修缮方案时对其进行了复原推测¹⁷;黄春和先生认为白塔寺建于辽永安寺原址之上,永安寺为辽道宗时所建,金末元初时被毁¹⁸。付幸先生对辽金塔基进行了论述¹⁹。劳敏先生经考证认为净光舍利塔出土的白瓷“童子诵经壶”应更名为“茶神像”²⁰。另外沈书权先生对天开塔创建年代和舍利的数量等进行了考证²¹。

4. 瓷窑址研究

北京地区瓷窑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龙泉务瓷窑性质的认识上。1975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门头沟军庄公社龙泉务村发现一处辽代瓷窑址,鲁琪先生认为北京地区出土的辽瓷大多应属于龙泉务窑烧造,龙泉务窑是具有代表性的窑址,同时认为龙泉务窑与文献记载中的山后八军瓷窑可能有关系,可能属于官窑²²。而之后冯永谦先生认为龙泉务窑址不是文献记载的山后八军瓷窑²³。到20世纪80年代末马希桂先生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之后40年间北京辽墓、塔基

1 郑恩准:《辽燕京寺庙考》,《考古》1972年3期。

2 郑恩准:《北京最早印刷品的发现及其雕造寺庙考略》,《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

3 林元白:《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文物》1961年4、5期合刊。

4 杨亦武:《澶渊之盟》,《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5 杨亦武:《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北京文博》1999年3期。

6 齐心:《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考》,《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2期。

7 向南:《千佛塔露盘题记考》,《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2日。

8 刘精义、齐心:《辽应历五年石幢题记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4期。

9 刘精义、齐心:《新发现的辽应历五年经幢题记考释》,《北京史苑》第三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

10 包世轩:《门头沟二则》,《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11 包世轩:《辽玉河县清水院经幢考》,《京华旧事存真》第三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北京文博》1995年1期;《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续)》,《北京文博》1995年2期。

12 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黄春和:《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13 齐鸿浩:《门头沟辽代伎乐经幢》,《北京文物报》1992年6期。

14 齐鸿浩:《辽代伎乐石经幢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15 任昉:《辽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丛考》,《北京文博》2005年2期。

16 齐心、刘精义:《“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2期。

17 梁玉贵:《房山陀里花塔原状探讨》,《北京文博》1996年3期。

18 黄春和:《辽代白塔寺史迹考》,《北京文博》1999年3期。

19 付幸:《北京塔基述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20 劳敏:《〈童子诵经壶〉应变更定名》,《首都博物馆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21 沈书权:《天开塔出土佛舍利之谜试解》,《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22 鲁琪:《北京门头沟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5期。

23 冯永谦:《山后八军瓷窑非北京龙泉务窑辨》,《文物》1979年3期。

出土白瓷的分析,认为细白瓷属于河北定窑,一般白瓷属于东北辽地瓷窑,质地较差的属于龙泉务瓷窑烧造¹,之后进一步通过对白瓷胎、釉和制法的分析,造型和花纹的比较,“官”款瓷器的讨论等,认为北京地区出土辽代白瓷大部分属于定窑和东北辽地瓷窑²。

到20世纪90年代初赵光林先生通过对“寿昌五”纪年款的三彩残片等资料的研究,分析龙泉务窑址的烧造年代为始创于辽初,停烧于金代,窑址性质有可能是官搭民烧³。之后黄秀纯先生认为龙泉窑与文献记载中的山后八军瓷窑有关系,其属于辽代官窑⁴;齐鸿浩结合龙泉务瓷窑的考古发掘,认为龙泉务窑也有上乘之作,因此北京地区出土的辽白瓷除特定种类之外,其他大部分为龙泉务瓷窑烧造⁵。黄秀纯先生还通过龙泉务窑址出土的大量器物及窑具的分析,探讨了龙泉务窑址瓷器的装烧工艺⁶。

20世纪80年代末赵光林先生认为磁家务窑址是北京地区最早的陶瓷窑址,烧造年代历经辽金元三代,窑址为辽代始创,主要烧造民间粗瓷,金代时在用料和烧造技术有很大进步,元代时烧造瓷器种类增多,可以烧制钧釉瓷器⁷。卢迎红先生探讨了辽瓷造型及装饰艺术⁸。

北京龙泉务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掀起了探讨北京辽代白瓷窑属的高潮,而要加强北京辽代瓷器的认识,还得靠进一步对北京地区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

5. 城址及乡村的研究

关于城址及乡村的研究与辽代文献资料关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初赵其昌先生对山西省应县发现的辽代燕京印刷的《妙法莲花经》尾的题记进行了考证,探讨了辽代燕京城内的显忠坊的位置、檀州街的定位、走向以及燕京城内的市⁹。20世纪90年代初,齐心先生对辽南京城址,坊巷、乡里等进行了综合研究¹⁰。到20世纪90年代贾敬颜先生对北宋路振、王曾所记燕京城进行了考核¹¹。进入21世纪后于德源先生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资料的对北京辽代村乡进行了考证¹²。于杰、于光度、周峰诸位先生对辽南京皇城位置进行了考证,认为皇城位于城内西南部¹³。

由于城市建设等原因,辽代城址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因此要直接对辽代城址进行考古发掘有较大困难。而在辽代乡村的研究方面,有必要结合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乡村的位置和界限进行推测,并对唐辽之间、辽金之间北京周边乡村界限和名称的变化进行讨论。

60年来北京辽代考古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以上五部分,各部分之间关系紧密。在对城址和乡村的研究要深入,就需要出土的考古资料充实;而在对瓷窑址的研究方面又离不开对墓葬出土瓷器的研究;佛教遗存与经幢等同时又是文献资料,而墓葬中发现的墓幢等又与佛教关系密切;对于墓葬壁画的研究又离不开文献资料。因此,北京地区辽代的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一个整体,只有把各方面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融合起来,才会对北京辽代考古有深入的认识。

1 马希桂:《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首都博物馆国庆40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2 马希桂:《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3 赵光林:《从“寿昌五”纪年款三彩残片看龙泉务窑的烧制年代及形制》,《北京文物报》1993年10期。

4 黄秀纯:《略论龙泉务窑址归属问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5 齐鸿浩等:《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6 黄秀纯:《龙泉务窑窑具及装烧工艺》,《文物春秋》1997年38期。

7 赵光林:《北京最早的陶瓷窑址》,《北京文物报》1989年13期。

8 卢迎红等:《辽瓷造型及装饰艺术》,《北京文博》2001年4期。

9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总1期。

1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11 贾敬颜:《路振、王曾所记之燕京城》,《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12 于德源:《辽南京(燕京)村乡指辨》,《北京文博》2001年1期。

13 于杰、于光度:《金中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周峰:《辽南京皇城位置考》,《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东城垣 1953年在姚家井第一监狱门前，发掘了1座唐墓，此墓经过多次破坏，志石已失，只留墓志盖一块，上篆“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16字。《日下旧闻考》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琉璃厂发现了辽御史大夫李内贞墓志。据此志得知，琉璃厂(辽时称海王村)，是辽南京城东门外郊区的一个小村落。按一般规律，墓葬多在城外。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称：“悯忠寺在大燕城内东南隅，子城之东。”今之法源寺即当年的悯忠寺旧址，则南京东城墙在此寺之东。又见《顺天府志·坊巷篇》曰：“外城南城，陶然亭东观音庵内，有辽寿昌中慈智大师石幢，称兹地在京东。”而《寄园寄所寄》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缦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疑为幽州城故濠。”而由河东薛府君墓的南北作线延伸，恰贯自新路、丞相胡同，与法源寺相距极近，烂缦胡同为幽州城故池濠信而有徵。

北城垣 在复兴门外复兴大路南的铁旗杆庙附近出土的唐元和元年幽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蓟州刺史陆日峴妻王氏墓志云：“葬於蓟北归仁乡刘村之原。”而白云观后有版筑败垣二小段，附近出土许多方石，可能是城的基石。北枕小河，系旧日城濠。由此败垣向东直线延伸，迄头发胡同，向西延伸达会城门村，似即燕京城北面。因此可证城之北垣在复兴门南，与金中都北垣一致，即在今会城门村一线。

南城垣 燕京南城垣现也无迹可寻。但万泉寺前土堆遗迹，或为中都的南垣。因此，辽南京南城墙应在万泉寺之北(按，金中部以辽南京城为基础，东、西、南三面各扩展三里)。又据菜户营附近的广恩寺，宋名清胜寺，在燕山府城外，此处距今外城西南角极近。由此知燕京南城垣，大致与右安门城墙相近。

西城垣 北京城西南蝎子门雷震口南北一线败垣，为金中都城西垣，因此辽南京城西垣当在蝎子门败垣之东，大约在会城门村东贯穿白石桥东。向南延长的一线，白石桥下的小河，或即当日的城濠。

皇城 唐藩镇子城改称皇城。王曾：《上契丹事》曰：“幽州号燕京，子城就西南罗郭为之。”(按子城即皇城之别称)皇城位于城西南隅，幅员五里，四面均有门。《辽史·地理志》云“西城颠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凉殿遗址大体在西城垣南端，而燕角楼的位置，据《京师坊巷志稿》曰：“今南北烟阁经三里许，皆以燕角楼得名。北烟阁直抵西便门，正如辽史所云东北隅也。”现在广安门内有南北线阁胡同，即南北烟阁旧址。这一带就地势观察，可以确认辽南京燕角楼位置即在今南线阁胡同。

关于辽南京的城垣周长及城门文献有载。《元和郡县志》载：“唐幽州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关于燕京城四至，按《辽史·地理志》云：“燕京地方三十六里。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供宸。”《乘轺录》载：“幽州城周二十五里。”许亢宗：《奉使金国行程录》云：“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记载各殊，地理志所云三十六里，较之以辽南京城为基础展筑之金中都城还多，因此，三十六里之说不足信，而二十七里之说较为可靠。

2. 街道、坊巷

南京城内道路，从相对城门引伸直交成井字形。道路左右有街，有坊(按坊兼或称“里”)。从发现的墓志记载，得知当时坊名：

卢龙坊 辽御史大夫李内贞墓志云：“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



隗台坊 赵德钧及妻种氏墓志云：“……于应历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燕京隗台坊之私第。”

北罗坊 见于辽咸雍五年(1069年)的韩资道墓志。

齐礼坊 见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王师儒妻韩氏志。

永平坊 见于重熙十四年(1045)王泽妻李氏墓志。

辽西坊 见于辽开泰九年的澄赞上人坟塔记，也见于唐姚季仙墓志。

棠荫坊 见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宸垣识略》)

此外，大田坊、归厚坊，均见于云居寺石经题记。而和时坊等九坊见于唐代墓志。坊有坊门、门楼，这是坊的标志，也是沿袭唐幽州城的旧制。坊内有府第、寺庙和一般居民住宅。据《乘轺录》记载：“幽州城……凡二十六坊。”

《辽史·圣宗纪》载：“辽圣宗太平五年，燕京居民庆丰收，全城庆贺，六街灯火如昼……。”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的《妙法莲花经》经尾题记云：“燕京松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可见南京至少有六条街，并知一街名，曰松州街。

3. 乡、里组织。

《辽史·地理志》：“析津县，本晋蓟县改蓟北县，开泰元年(1012年)更今名。”辽代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县、乡、里组织。县以上组织见于文献，而乡、里少见甚而见于文献，只能从出土的实物资料了解与补充。辽南京乡、里名称、位置，可从出土的墓志记载略述如下：

仁寿乡 见于张俭志。志云：“……葬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此志出土于海淀区魏公村，古今地名对照得知辽南京仁寿乡陈王里即今魏公村一带。

仁寿乡 又见于丁文道之子丁洪墓志。志载：“……葬于仁寿乡陈王里。”此志出土于西郊百万庄。可见“仁寿乡”范围之大。

仁寿乡 也见于董匡信志。志云：“葬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南刘里……。”该志出土于阜成门外洪茂沟一带。该文不仅提供了仁寿乡的范围，而且使我们得知，此乡至少包括两个里即陈王里、南刘里。

房仙乡 复兴门外公主坟马路北侧出土的王师儒墓志载：“葬于析津府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之西北原。”还见于韩佚、韩资道等韩氏族墓志，韩佚志云：“葬于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从先茔礼也。”(按幽都即蓟)韩志出土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据上述记载得知，房仙乡范围，东界约在今复兴门外公主坟一带，北界约在八宝山一带。房仙乡包括池水里和鲁郭里。根据几合墓志出土地点判断，鲁郭里应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以东一带，但实地考察，其东无“鲁郭里”地名，而与此地相对的马路南面有一村名鲁谷(按郭谷音近)，鲁谷似为鲁郭之讹，至于位置移动，可能是因为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

仁和乡 见于昌平县城西墙一带出土的辽史洵直墓志。志载：“葬于昌平县仁和乡东道里……。”这一发现，为清代麻兆庆《昌平外志》记载的辽代邨名又增一实物例证。

西北乡 辽代鲜于氏墓志载：“葬于析津府宛平县西北乡南樊里之先茔。”该志出土于西郊二里沟，联系丁文道志出土于百万庄，此地属辽南京仁寿乡，因此证西北乡与仁寿乡相接壤。

西北乡 康公墓志记载墓主人逝于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火化后同年下葬于“燕京宛平县矾村,名西北乡”,墓地位置在海淀区增光路中国工运学院住宿楼北部¹。说明此处亦属西北乡。

使相乡 赵德钧妻种氏志载:“……祔于燕京蓟北县使相乡勋贤里齐王之莹。”此志出土于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洋桥村。因此可知该地辽时为使相乡勋贤里。

广老乡 李继成妻马氏于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卒,“当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幽都县广老乡真宰里祔先莹”。该墓志出土于丰台路口南侧²,因此可知此地古地名为广老乡。

招贤乡 马直温妻张绾墓志云:“葬于燕京析津县招贤乡东碁里……。”而此志出土在大兴县京开公路西红门段东侧。古今地名对照,得知此处辽代为招贤乡东碁里。

招贤乡 大兴持净院塔林出土经幢题记有“析津县招贤乡西碁里”。说明此处也属于招贤乡³。

太平乡 辽王泽夫人李氏墓志记载:“重熙十四年(1045年)十月十二日葬于宛平县太平乡万合里。”此志出土于丰台镇。唐故汝南郡夫人周氏志也记载有太平乡。该志出土于马连道附近,因此可得知太平乡从马连道可南到丰台镇南北至少约五公里范围。

燕下乡 辽李内贞志载:“……保宁十年……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说明墓志出土地点在琉璃厂一带,辽时属燕下乡海王村。

里,即是村,是乡属行政单位。从出土墓志、经幢记载有:

南刘里、陈王里(仁寿乡);池水里、鲁郭里(房仙乡);勋贤里(史相乡);东道里(仁和乡);万合里(太平乡);南樊里、矾村(西北乡);东碁里、西碁里(招贤乡);海王村(燕下乡);真宰里(广老乡)。显然村也是乡属组织,“村”与“里”是同级行政机构。

二、塔 基

辽统治者崇佛,佛教盛行,城内外庙宇相望,古塔林立。近年来在佛教考古方面,除云居寺石经版发现外,塔基的发掘和塔身中瘞藏文物的发现也是一项重要的收获。

1. 房山区云居寺南塔塔基

房山云居寺是一处古代的佛教圣地。寺之北与南各有一辽塔,通称“北塔”、“南塔”。南塔又称“压经塔”,辽天庆七年(1117年)建。20世纪50年代在南塔基旁的藏经洞穴中,发掘出石经版10082块。经版数量之多,工程之浩大是惊人的。石经是隋代僧人静琬始刻的。唐、辽、金、元,续有刊刻。历时1000多年。石经收藏在石室中,用灌铁汁的石门封存。辽圣宗时,韩绍芳(辽代豪族、崇文令公韩延徽之孙)打开石门,进行验对,呈奏圣宗,后命僧人可玄继续刊刻,补缺续新,一直继续到辽亡,完成大小石经近5000块。这是一次对佛经较大规模的校勘、整理⁴。

1 朱志刚:《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墓志》,《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2 王清林等:《丰台路口南出土辽墓清理简报》,《北京文博》2002年2期。

3 于璞、韩鸿业、李春山、王冠群:《北京辽金时代塔林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20日。

4 中国佛教协会:《房山云居寺石经》。



图7-2 天开塔

2. 房山区天开塔地宫

由于发生了文物盗掘事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房山区文物管理所于1990年6月对天开塔地宫进行了清理发掘（图7-2）。

地宫入口位于塔基的南部，是方形竖穴式天井，天井底部有券门通入地宫。地宫顶部为圆形穹隆顶，底部呈八角形，长2米。在每个转角处有一组影作斗拱。斗拱及顶部均有彩绘。顶部彩画为荷花，下面为分为八面，每面内有成组的花草。两面中间相隔的“阳马”上绘有网目纹。斗拱下方每面绘有覆莲，斗拱上绘有云纹等。壁画上方中间装饰山花蕉叶，是小木佛道帐的做法。在南、北、西三面壁上发现有题记三处，其中两处脱落后字迹不详。靠门左面墙壁上的题记为“乾统十年八月五日当县燕谷村刘瑞……”，此纪年是该塔建造的准确年代。

图7-3 四花瓣纹
供椅

图7-4 四花瓣纹
供桌



地宫内中间有1座砖石构件层层叠放构成的舍利小塔。塔的中部是一石函，石函内有铜函，铜函内放有银函，银函内又装有一件小银瓶和一件装有5枚“应化舍利”的水晶瓶。在石函、石函座上及铜函、银函上均刻有文字。文字主要记载了该塔建造的历史及修建该塔捐款的村名和人名。在地宫内还发现有木椅（图7-3）、桌子（图7-4）、大瓷碗、小瓷碗、银钵、银勺、银筷子、铜镜、铜铃、石佛、小木佛等文物20余件¹。

3. 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塔基

1977年6月3日，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因年久失修向南倒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对残塔和地宫进行了全面清理。

此塔是1座平面呈八角形的十三层密檐实心塔，建于辽代重熙二十年(1051年)，1976年因塔身倒塌而进行全面清理发掘，揭示了塔身内部与地宫的结构，并得到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地宫呈方形，砖砌叠涩顶，顶盖为一长方形石板，中央有一圆孔。地宫未被扰动过，各种供物齐全。地宫中央偏南置石函，函四面雕刻彩色花卉，镌刻年款（图7-5）。内盛石质释迦涅槃像，银幡、花、匙、筋、碗、碟以及水晶串珠等。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发现在地宫盖板上立着高3米多辽应历五年(公元955年)石幢1座。幢身满刻陀罗尼经文。幢的四同散放着20余件唐至五代的残石佛像，该塔可能毁于唐会昌年间灭佛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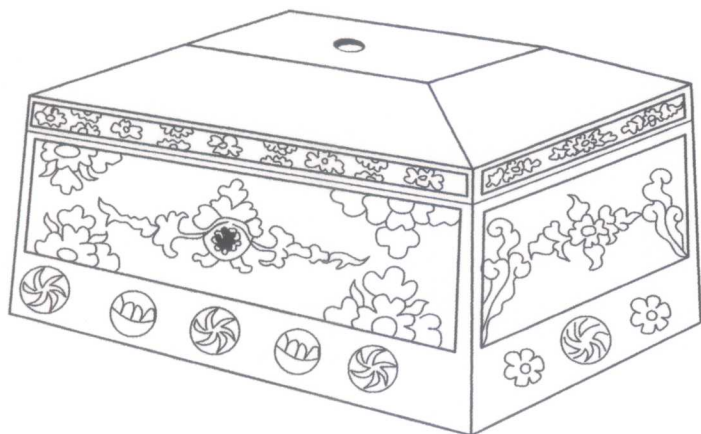
在第一层塔身中央立一陶幢，平面呈圆形，筒形陶幢也是首次发现，高约2.18米，幢身刻经和年款。为后唐三年造(公元932年)，更为新奇的是幢的四周立4座陶塔（图7-6）。有平面呈圆形的，也有呈八角形的，塔由③~④层组合而成，塔身上满布彩绘，浮雕佛像，均高2米多，十分精美。据考，这种中间一幢，周围立塔的形式，是佛教四面立佛之说的象征。这些幢、塔是施主施舍捐建的，是作功德的一种方式。

石幢题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幢文记载栗园官庄、主持谦讽以及官名十将、青白军使

1 王武钰：《房山区天开地宫》，《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图7-5 北郑村
辽塔基出土
石函

图7-6 北郑村
辽塔出土陶塔



7-5



7-6

乃至地名，都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宗教、人物、官制、地理提供了新资料。

此塔除用一般辽代青色长方形、方形勾纹砖外，还有方形各种伎乐砖，有的吹笙篴、笛子、箫，有的翩翩起舞……还有的上刻文字的法舍利砖。最重要的一块是上墨书“大蕃天显癸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15字的纪年砖。似乎辽代又有“大蕃”之称，由于辽史疏漏，文献记载寥寥。甚至自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后，国号为“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国号更易，辽史无载，因此，曾经称“大蕃”，更不会见文献。所以，该纪年砖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辽代国号的新看法，新资料¹。

4. 密云县冶仙塔塔基

密云区冶仙塔位于密云县城东北2.5公里的冶山上。据《密云县志》记载，此塔建于辽代。原塔的形制为八角形砖砌二级三重檐式。第1层有门，可以出入，六面有砖窗。檐下及须弥座上均有砖砌的斗拱，每边一攒，须弥座束腰部雕有花纹和角神，拱眼壁上雕兽面纹。塔高12米，直径约6米。塔的第2层是清代重修的。考古发掘前塔已毁。1988年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塔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塔基保存状况较差。地面以上部分已全不存在，地宫也只有南壁保存稍好。据残迹可知，地宫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3米，东西宽约1米，深约0.4米，北壁有门。砌法为错缝平砌，砖为沟纹砖，长40、宽20、厚5厘米。地宫内的墙壁涂抹白灰。底为砖铺，顶盖为长方形青石板，中有一孔，孔径6厘米。

地宫内出土的器物以陶瓷器为主，共有40余件及大量铜钱。瓷器有玳瑁纹绿釉净瓶（图7-7）、四瓣花纹白釉方碟（图7-8）、葵瓣越窑盘（图7-9）、秘色瓷碟、圆形白瓷碟、陶经塔（图7-10）。还出土有葫芦形瓷坠1件、佛串珠1颗、玻璃器1件。铜钱70余枚，多为宋钱²。

1 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2期。

2 王有泉：《北京密云冶仙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2期。